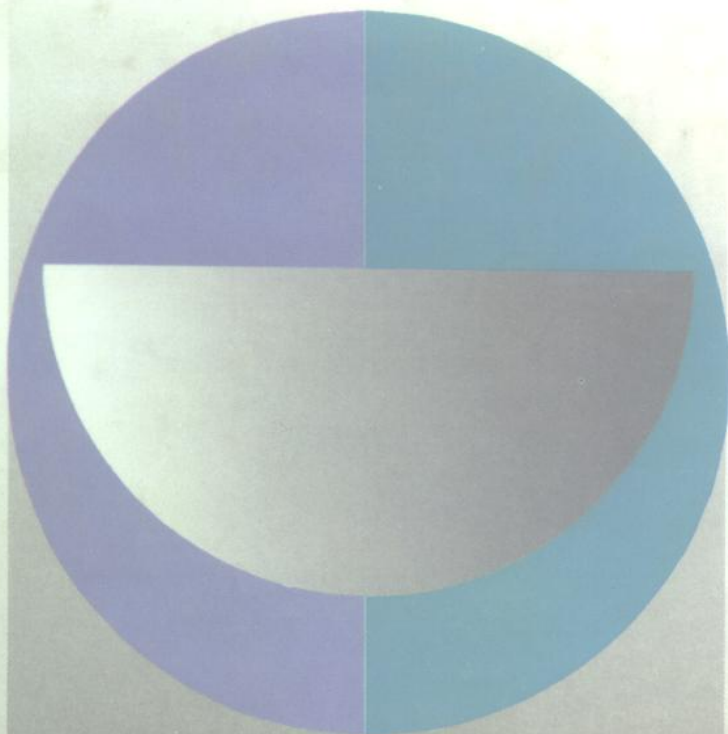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

韩国独立运动 与中国

石源华／编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石源华／编著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

韩国 独立运动 与中国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1 号

责任编辑 张美娣
封面装帧 陆素义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

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

(1919—1945)

石源华 编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9.25 插页 5 字数 445,000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内平装本 500)

ISBN7—208—01946—0/K·433

定价 精 36.00 元 平 32.00 元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 韩国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庄锡昌

委 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石源华（常务）、朴昌根、任 晓
庄锡昌、周明伟、金光耀、黄美真
杨立强

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支援刊行



总 序

中韩两国自1992年8月24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政治、经济交往与文化交流进展非常迅速。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两国人民在历史上就存在源远流长的密切交往;其二,两国毕竟是关系紧密的近邻;其三,更主要的原因也许是,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中,两国彼此都需要对方的友好合作与互利交往。

中韩两国都是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古国,又紧密相邻。纵观五千余年两国关系史演变的全貌,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和睦友好的状态,在两国的文明演进过程中,相互都给予对方以许许多多积极有益的影响,促进了两国社会的进步与文化的繁荣。

在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交往中,我们可以发现,中韩两国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建筑风格,乃至思想意识形态诸方面都具有惊人的雷同之处。如果再作更进一步的探索,我们还会发现在两国人民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具有某种血缘方面的承袭关系。可见中韩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多么密切,不同于一般。悠久的历史告诉我们,和睦相处、友好合作是两国人民历来的共同愿望,也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近数十年来,勤劳刻苦的韩国人民奋发图强,努力发展经济,在短短二、三十年间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创造出令世人赞叹的“汉江奇迹”。中国也于1978年底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中国人民正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经济的发展,以求早日实现经济的现

代化。由于中韩两国具有极其类似的历史经历与文化背景,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往往会碰到许多惊人地类似的情况。韩国人民的经历,可以为中国人民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再者,在两国进一步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彼此又有可能提供多方面的互补互利性的帮助。尤其重要的是,在维护远东与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的过程中,中韩两国之间的合作与共同努力,亦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两国的合作将是一股有相当份量的稳定力量。

总而言之,历史的传统,现实的需要,都使得我们充分认识到中韩两国人民需要和睦相处、友好合作。和睦和友谊的基础是彼此了解,由深刻的了解进而达到彼此的真正理解。理解是友谊的基础。然而,过去有数十年时间,由于我们实行自我封闭的政策,使得我国的广大人民对其他国家人民的情况知之甚少,或者说了解极其不全面。中韩之间更是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隔绝达三十年之久,彼此了解甚少,更谈不到相互理解了。

近十余年来,我本人主要致力于世界文化史的研究与传播。我这么做的目的之一,便是试图使我国人民有机会充分了解其他国家的人民,了解世界其他国家人民所具有的不同于我国的文化背景,以求达到彼此之间的理解,从而促使中国人民在世界各国民族之林中与各国人民友好平等相处。我认为,只有充分了解了其他国家的文化背景,才有可能全面地、完整地吸取别国人民的历史经验,以利于我们更顺利地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现代化的国家。

1992年10月,复旦大学成立了韩国问题研究中心,目的在于推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彼此了解,进而达到彼此深切理解。为此,我们聚集了校内外一批关心韩国问题的学者,一起来研究韩国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外交、中韩关系等问题,并在上海人

民出版社的积极支持下,出版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以及《韩国研究论丛》。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有助于中国人民全面地了解韩国人民的昨天、今天与明天。我们也将努力做一些工作,向韩国朋友介绍中国,使他们能全面地、完整地了解中国人民,理解中国,从而使得中韩两国人民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建立在牢固稳定的基础之上。

理解与友谊——这就是我们出版这一套丛书的基本宗旨。

庄锡昌

1994年11月5日

目 录

总 序.....	1
绪 言.....	1
一九一九年	15
一九二〇年	59
一九二一年.....	103
一九二二年.....	124
一九二三年.....	126
一九二四年.....	134
一九二五年.....	137
一九二六年.....	143
一九二七年.....	149
一九二八年.....	156
一九二九年.....	161
一九三〇年.....	164
一九三一年.....	173
一九三二年.....	187
一九三三年.....	210
一九三四年.....	214
一九三五年.....	217
一九三六年.....	223
一九三七年.....	225

一九三八年·····	239
一九三九年·····	257
一九四〇年·····	273
一九四一年·····	310
一九四二年·····	349
一九四三年·····	407
一九四四年·····	454
一九四五年·····	522
主要参考文献·····	601
后记·····	605

绪 言^{*}

1919 年在中韩两国历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代。以五四爱国运动为标志,中国人民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斗序幕;以三一反日起义为起点,韩国人民进入了争取独立复国运动的新阶段。

日本灭亡韩国之后,不堪忍受暴日虐待的三韩亡族大批越界进入中国东北,流亡华北、华中、华南各地;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蓄意鼓励日人大量移殖韩国,致使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韩国侨民剧增。仅东北一地,据 1928 年中国方面调查有 90 万人^①,而 1931 年日本方面秘密调查则认为已超过 200 万人以上^②。在华韩国侨民饱受失地亡国之痛,藉俄国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世界民族革命巨流,以三一起义为起点,开展了独立复国运动。

由于在华韩国侨民的反日斗争与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目标一致,共同的利益使双方的斗争互相支援,互为配合。中国人民曾给予在华韩国独立运动以各种形式的支援,在华韩国侨民的反日斗争也鼓舞支持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斗

* 本文系编著者 1989 年 12 月提交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第 14 届韩国史国际学术会议论文,原题为《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南北政府》,后发表于《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 5 期。现略作修订,代为本书绪言。

① 许兴凯:《日本帝国主义与东三省》,第 19 页,上海昆仑书店 1930 年版。

② 何西亚:《东北视察记》,第 57 页,上海 1932 年版。

争。另一方面,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华侵略的加剧,中日冲突频起,并最终走向全面战争,在华韩国侨民及其反日运动常常成为中日冲突与交涉的热点问题,而中日两国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方面的因素,也必然影响和制约中国历届政府对于在华韩国独立运动的态度而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

1919年韩国三一反日起义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第一阶段。

1919年3月,正当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为争回山东权益艰苦奋斗,全国反日浪潮四起,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之时,韩国全境爆发了有200多万人参加的反日大起义,要求实现韩国独立,这是韩国人民亡国近10年来反日意志的总爆发,极大地震撼了日本统治者。日本朝鲜总督在给政府的报告中承认:起义“蔓延至半岛之每一角落”,虽经暴力镇压,“骚乱不但未被遏止,而且更变本加厉蔓延到不可收拾”^①。

在三一起义鼓舞下,多年来活跃在中、韩、俄边境地区的韩国各独立运动团体及韩国独立军闻风而动,开办军官学校,征募壮丁,贮蓄粮食,建立反日军事基地。不仅在中国境内袭击日本领事馆及各种机关,给予进入中国境内围剿的日军重创,而且屡屡向国内出击,袭击日军,“爆毁公衙”,“公然白昼杀害日本警察官吏”,猛烈冲击了日本对韩国的殖民统治^②。同

① 罗拔奥利华:《李承晚》,第133页,台湾淡江书局1957年版。

② 日本外务省《关于珲春事件宣言》,《盛京日报》1920年10月14日。

时，流亡上海的韩国独立党人于4月10日成立韩国临时政府，与东北韩国侨民的反日斗争紧密联系，形成了在华韩国独立运动的第一个高潮。

韩国人民的反日斗争得到了中国人民的理解与支持。4月5日，广东康基镐等311人致电北京政府，将韩国比作“东方之巴尔干”，认为“此问题解决之前，永久和平不能来也”，要求飭令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提出韩国独立问题。北京中华民国各界联合会也发表《援助韩人通电》，指出“中国对韩国独立有援助之必要，且有积极援助之义务”，“韩国独立非排日问题，乃生存问题，非韩国一部问题，乃东亚及世界问题”^①。

南方护法军政府也对韩国独立运动表示支持。三一起义发生后，广州非常国会会议曾通过承认韩国独立决议，并致电南方政府出席巴黎和会代表王正廷，要求他在和会上主张韩国独立^②。1921年10月，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领袖孙中山在广州会见韩国临时政府专使、国务总理兼外务总长申奎植。申奎植向孙中山提出了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收容韩国学生于中国军校、借款500万、租借地带养成韩国独立军等项要求。孙中山虽因“北伐尚未成功，国家尚未统一，仅以广东一省力量”，难以满足韩方全部要求，但仍明确表示对于流亡中国而继续奋斗之韩国临时政府“自应予以深切同情而加以承认”，将通令护法军政府所属各军校尽量吸收韩族子弟接受军事教育，并一再承诺“北伐计划完成以后，届时当以全力援助韩国复国运动”^③。

然而，执政的北京政府及东北地方当局的态度则不同。当韩

① ② 范廷杰：《韩国临时政府初期的政治与外交》，《传记文学》第27卷4期。

③ 闵石麟：《中国护法军政府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始末实记》，1924年7月刊印。

国移民的武装反日斗争在中国东北边境地区蓬勃兴起之后，首当其冲的吉林地方当局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强大压力：一方面，日本政府一再训令驻华公使及该地领事，要求中国方面严重取缔在华韩国独立运动，并在境内调兵遣将，气势汹汹，以向东北出动军队、配置警察相威胁；另一方面，延吉地处偏僻，山深林密，原为马贼出没之区，昼伏夜动，随散随聚，韩国独立党人的反日斗争客观上给马贼活动创造了某些条件，使该地区的治安出现严重失控的局面。吉林督军鲍贵卿在给北京政府的呈文中，对“三韩之亡族为大势所趋，揭竿继起，挺刃走险，奔走呼号，众势汹汹，其事虽属碍我邦交，其志诚不可夺”，给予相当程度的肯定，但同时又指出“在吾国领土倡言独立，携带武器自由行动，既为公法所不许，尤为国际所难容”。他提出的对策是：“形式上宜取严格主义而杜日人刁难要挟之口实”，“实际上宜取严宽并济主义”，“如遇大股武装韩党，仍以公法主权利害之词详细告诫，但使该党能以甘心折服，缴械自散”，“倘仍坚持不服，或公然反抗”，“至迫不得已时，即以武力解决”^①。这大体上反映了北京政府的态度。

但北京政府的这一立场遭到日本政府的强烈反对。以珲春事件为转折，日本政府军事、外交双管齐下，不断逼迫北京政府与之联合镇压韩国独立运动。1920年10月2日，韩国独立党人从俄国境内的双城子潜入珲春，焚毁日本领事馆及街市，击毙日本警察等10余人^②。6日起，日军以此为借口，出动1万兵力，占领珲春及和龙、延吉、汪清、东宁、宁安5县，焚烧韩国移民家宅1000余户，惨杀移民2100名，华人200名，并在所到之处擅设

^① 北京政府参陆办公处档案(10143283)。

^② 《珲春惨杀案再志》，《盛京日报》1920年10月7日。

日本警察署^①。北京政府出于敦促日本撤兵的外交考虑,由东北当局出动重兵赴延吉各地,驱逐并镇压韩国党人,并以中国兵力足以维持秩序、保护日侨为由,要求日本撤兵和撤警。1921年初,在北京政府一再交涉下,日本虽答应撤兵,却坚持不肯撤除非法设置的日本警察署,并强行派遣军事联络员分驻珲春、六道沟、头道沟等地,使该地区处在日本警察的监视和管辖之下,并随时面临日本军事干涉的危险。在这样的形势下,韩国独立军各部为减地主之麻烦,决将军队向深山老林布置。1921年2月经远东共和国许诺,进入西伯利亚南部休整,各派军队统一整编为高丽革命军,仍在中、韩、俄边境地区进行反日斗争,但进攻的势头已趋减弱^②。

日本帝国主义却并不就此满足,他们出于实现所谓“满蒙政策”、侵吞中国东北的战略目的,继续不断强迫东北地方当局取缔韩国侨民的反日斗争。1925年6月11日,奉天警务长于天珍被迫和日本朝鲜总督府警务局长三矢官松在奉天签署《取缔韩人办法大纲》,规定:韩国侨民依清乡章程严查户口,编牌互保;各县严禁携带武器侵入韩国,犯者捕交韩国官宪;解散韩国革命党,收缴枪械,逮捕韩国官宪指名之韩国党魁予以引渡;中日互通报取缔实况等^③。1927年9月18日,更由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与省长莫德惠正式签署《取缔东三省韩人协定》,重申上述规定^④。国民政府建立以后,曾在黄埔军校吸收韩籍学生,并

① 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下),第235—240页,上海太平洋书店1931年版。

② 范廷杰:《在中国东北的韩国独立军》,《传记文学》第27卷3期。

③ 外交学会:《外交大辞典》,第99页,中华书局1940年再版。

④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第141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初版。

给予在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以一定的支持,但易帜归附国民政府的东北地方当局却在日本越来越严重的外交压迫和军事讹诈下,未能改变以往对于在华韩国独立运动的基本态度。

二

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为第二阶段。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出兵侵占东三省,全国迅速出现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在华韩国独立运动东山再起,形成第二个高潮。在东北,长期坚持反日斗争的韩国各派抗日武装趁机重振军威,金日成建立的反日游击队、李青天领导的朝鲜革命军等各路大军,与遍及东北各地的中国抗日义勇军并肩作战,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在上海,韩国独立运动各团体丙寅义勇队、劳兵会、独立运动者同盟、青年同盟、兴士团等集会决议组织联合会,发表通电反对日本侵略东北。韩国临时政府发表《告东三省同胞书》,号召建立中韩两民族之共同战线,要求“担任密侦之同胞采取直接行动,努力于最短期间对敌人作根本消灭之计划,在上海方面者则作最后决死之努力,为东三省同胞后援,以全力剿灭敌人之主力”^①。1932年4月29日,韩国独立党人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日本侨民天长节庆祝会主席台下埋弹,一举炸毙炸伤日本军政要人白川义则、重光葵等多人,举世震惊。韩国人民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无疑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支持。

从九一八到七七,中日关系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变化,国民政府面对日本的军事威胁与严厉监视,采用各种公开的或秘密的

^①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十年来朝鲜的反日运动》,1938年6月印行。

方式支持在华韩国独立运动。在组织体系上,主要通过两个系统,一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萧铮等,一是军事委员会情报工作机构贺衷寒、藤杰、康泽、戴笠等,与相关的韩国各独立运动团体人士,主要是韩国临时政府保持联系,提供各种可能的援助^①。

1932年4月尹奉吉血染虹口公园后,日本军方采取大规模报复行动,主持其事的韩国临时政府金九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委派萧铮全权负责,曾秘密数易其住所,调动各地军警暗中保护,使其免遭毒手。8月,经蒋介石亲自批准,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每月拨款5000元作为补助费,交金九以备经常之用,其他事业费可由金九提出计划,经蒋核准后另行拨发^②。

根据韩国独立运动的现状,国民政府将援助重点放在帮助韩族培养军事人才方面。1933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秘密会见金九。蒋介石表示:“若以特务工作来杀死天皇的话,又有天皇出来;杀死大将的话,又有大将出仕。着眼将来的朝鲜独立战争,建议先训练一批武官。”此话得到金九的赞同^③。自1932年10月起至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分别在南京、洛阳及江西、湖北等地举办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对外称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队第6队)3期、中央军校特别班1期、洛阳军分校训练班第17队1期、韩国独立军特务队预备训练所1期、军事委员会政训班朝鲜学生队1期。另外,中央军校第10、11期分别招收数十名韩籍学生。据粗略统计,中国军校6年间共招收韩籍学生415名^④。这批军事人才除少数留在中国军队担任谍报、策反、教育俘虏等工

① ② 萧铮:《中国协助韩国光复之回忆》,《传记文学》第44卷至45卷连载。

③ ④ 范廷杰:《韩国革命在中国》(之八),《传记文学》第28卷4期。

作,相当部分派往各地从事反日斗争,战时成为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的主要骨干,战后在韩国国内的军事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军校招收并培养韩国军事人才曾遭到日本方面的密切关注,并一再抗议。国民政府为了避人耳目,曾采用干部训练班、特别班、训练所等各种名目,并不得不经常变动驻地。仅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就在南京三易驻地,以防备日本特务的骚扰与破坏。而军事委员会政训班韩籍学生则先后在江西星子县、湖北江陵县等偏僻之地受训。1935年8月,日本外务大臣广田提出“对华三原则”,摆出改善对华关系的姿态,中日两国间曾数度举行调整国交谈判,日本政府趁机要求中国“解散鲜人军官学校”,“取缔其他不逞鲜人”。1936年8月20日成都事件发生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更将“开除军校鲜籍学生”,列为6项交涉条件之一,不断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①。国民政府为了缓和对日关系,表面上曾下令将供职于中国官署的韩人强行解职,不准洛阳军分校训练班第2期韩籍学生入学,下令南京中央军校特别班韩籍学生退学等,但实际上并未真正执行,日本内务省警保局的情报表明:“南京中央军官学校鲜人学生依然留在校中”,“所有各种处置,纯为表面敷衍”^②。

三

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为第三阶段。

如果说七七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对在华韩国独立运动的支

^① 台湾外交问题研究会:《芦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1966年编印。

^② 金正明:《朝鲜独立运动》I第580页,引自《传记文学》第28卷4期。